

文苑笔谈

奔来眼底文字流 离题万里不走心

刘效仁

“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出自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批评写文章洋洋洒洒却不得要领。如今，有重温这篇佳作的必要，细读细品有振聋发聩之效。

当然，下笔千言，也可以解释为纵横捭阖，汪洋恣肆，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也叫文章大加。大加之大，在于能够“天下黄河一壶收”。虽洋洋洒洒，“离题万里”，却篇末点题，入题，切题，仍不愧为大手笔，不失大家气象。只可惜，大加太少，小家子又太多，而且特别地喜欢“下笔千言”。喜欢堆砌华丽辞藻，滥用辞格，以及空话、大话、套话连篇累牍，以显文采奕奕，博学多才，博大精深。实则，如一句粗俗话所说，姜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博士、臣子。北齐的文学家颜之推，著有一部《颜氏家训》。在其《勉学》篇中，就记载了他到郢城去办事时，听到的一则笑话：“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这博士熟读四书五经，满肚子都是经文。家里的驴子死了，需要到市场买一头。双方讲好价码，博士要一份凭据。卖驴人不识字，请其代写。于是，该博士摇头晃脑，写了密密麻麻三张纸。卖驴的人听后却发难：“先生写了满满三张纸，怎么连个驴字也没有呀？其实，只要写上某月某日我卖给你一头驴子，收了你多少钱，也就完了，为什么唠唠叨叨地写这么多呢？”惹得旁观者一场哄笑。

“言辞鄙陋，风操拙，相与专固，无所堪能，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这正是颜老先生所厌恶的。

这是民间交易，如此啰唆行文，连篇废话，不得要领，不着边际，不过受人一场嬉笑罢了。要是如此撰写公文，上奏折，发通令，显然会误人、误时、误事，恐怕要打屁股、挨板子了。

明朝有个刑部侍郎叫茹大素，协助尚书掌管全国司法、刑狱事务。虽以耿直和忠心著称，其奏折写作风格却常常令皇帝和大臣们感到头疼——所写奏折通常非常冗长，内容繁复，大而不对，文不对题。1375年，茹大素竟写出了一篇长达1.7万字的奏折，其中前1.65万字的部分，都是废话，并未切入主题。如此下笔万言，离题万里，也是空前绝后。

当然，这需要文才横溢，文思泉涌，还需要笔锋凌厉，眼神好，身体健，手腕儿有功夫。否则，动辄数以万字计的折子，如此蛮拼，不是人人都可以完成的。在我看来，最拼的，还是体力。本人写篇数千字的随笔，都得耗时费力，费心巴力，细想想，仅字数而言，不能不对茹大素产生敬畏之心、仰慕之情。但问题是，奏折是要人看的，看折子的还是日理万机的皇上，同样要拼体力。如此冗长繁复，华而不实，隔山放炮，搁在当下自由阅读时代，恐怕点击量、流量，一个量也无。皇上听了忍不住，命人将茹侍郎叫到大殿之上：“你给朕说说，你们刑部官吏200多人中，哪些是迂腐的儒生，哪些是庸俗的官吏？”茹大素支支吾吾，称其实“刑部官员那么多，臣也并不是全都认识。”你连你们刑部官员都认识不全，敢在这里胡说八道，说这些没用的？”怒不可遏的朱元璋，令人将茹侍郎拖出去打了一顿板子。

看似无妄之灾，实则咎由自取。一半，为华而无实，言而无实；一半，为冗长繁复，哗众取宠。说到底，还是无用之文大繁，以致皇上心烦。据说，朱元璋从此让中书省制定了奏折的格式，限制了字数，要求简洁明了。自此，大臣们再也不写那种空泛的套话，文风随之大变，政府效能大增。说起来，如此文风改革，茹侍郎也算“功不可没”。

清代雍正朝时台湾归福建管辖，福建巡抚毛文铨的奏折，所言多是台湾之事。在《朱批奏折辑录》中，所辑毛文铨的奏折就多达12篇。不难发现，毛巡抚尚是一个勤政的官员。其中，有“奏闻台湾情形折”，有“奏闻收成分米价折”，也有数篇“奏闻事折”，当然也免不了“仰恳圣恩折”。也有一说，叫“请安折”。

事实上，请安折，一开始类似于见面打声招呼，没有特殊内容，是皇帝特许不在京城的环境下，与其保持联系的一种特殊渠道与权力。如康熙朝时，有资格上折子请安的并不多，大多是督抚提镇以上的官员。皇帝的回复，一般也只批“朕安”两字，如果身体有特殊状况，或心情大好大坏，才会多加描述。是故，请安折一般由官员差信家奴送到京城，再由皇宫专门负责接收的靠谱太监转交皇帝，因此只有皇帝一个人可以看到内容，保密性极强。若不是皇上自己剧透，外人并不知道臣子究竟都写了些什么。愚以为，请安折之类其内容无非问候语、道歉语。话不在多，文不在繁，情到而已，心到而已。未想到，毛文铨的请安折，竟惹得雍正大怒，写下了如下朱批：“此等狗屁文章，朕在藩邸时一日能写十篇！尔若再敢以虚词搪塞，朕便令尔日作三篇呈览！”未几还补了一句：“雨水粮价实报来，再若欺瞒，仔细尔皮！”此奏折，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网络上也能查到。未笔，朱红印上，确信无疑。

原来，毛巡抚上的请安折，通篇堆砌了华丽辞藻，看似下笔千言，实则敷衍应付，走眼不走心，难怪自招无趣，自取其辱。所以雍正说“此等狗屁文章，朕在藩邸时一日能写十篇”！如若你还能在此卖弄文才，显摆博学，岂不是班门弄斧，东施效颦？还是省省罢，免了罢。

知古鉴今。而今“流量为王”，过度滥情的媒体献词，既是语言的腐败，也是文风的堕落。这样的文风，当然需要整治，需要打板子！

史评

红安革命法庭布告与人民司法制度

闫永乐 阴佳雨



七里坪革命法庭审判厅

《红安县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布告》现藏于湖北省红安县革命博物馆，为油光纸油印，长43厘米，宽39厘米，由右至左竖式排列，字迹清晰，字体浑厚庄重，保存较好，是国家一级文物。该布告被认为是现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法律文书，体现了我们党不懈斗争、司法为民的法治理念，为探寻、学习红色法治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犹如黑暗中的火炬，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引了前行的道路。法治建设是加强政治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党始终坚持改善、加强根据地的司法工作，将贴近群众、英勇斗争等理念贯穿于法治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将司法为民的情怀植根群众心中，使中国共产党的司法制度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信赖与拥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保驾护航。

从《红安县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布告》中，我们感受到人民司法制度蕴含的斗争精神。该布告源自七里坪革命法庭，遵循《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精神，出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革命法庭庭主席（庭长）闵丹桂之手。七里坪革命法庭被誉为“中国革命第一法庭”，以审判土豪劣绅为主要职能。从布告的行文措辞中，能深切感受到人民司法对反动势力毫不留情的打击决心。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的司法制度早已为官不为民、为富不为贫，成为统治阶级维护特权、鱼肉民众的工具，普通群众不能也不敢通过司法制度来求得救济，而红安县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一经诞生，审判过程、判决结果便以布告昭告天下，从此公平正义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每一个判决、每一项宣告，都是对反动旧秩序的宣战，是人民夺回司法主

权、捍卫自身权益的呐喊。经七里坪革命法庭审判的恶霸劣绅、反革命分子，无论此前如何嚣张跋扈，都必须在此布告的威严下低头认罪。这份布告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人民司法斗争精神的生动体现，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不断推动法治建设迈向新高度。

从《红安县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布告》中，我们感受到人民司法制度蕴含的人民情怀。九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走进七里坪革命法庭，审判席后方高悬的“犁头旗”仍然鲜艳耀眼、令人瞩目。犁头是农民耕耘土地的重要工具，是广大底层劳动者的象征，代表着朴实无华、辛勤劳作的人民大众，将其高悬于审判席后方，无疑是在向世人宣告，人民司法制度的根基深深扎根在人民的土壤之中，它的使命便是为人民伸张正义，为百姓守护安宁。

受特殊的历史时期影响，早期的革命法庭案由国民党党部管理，只是法庭人员由共产党人担任，



红安县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布告

书评

驻所检察的所见所闻所悟

李砚明

滴，积极思考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不断提醒自己不要虚度了在这里工作的时光。2012年7月，我离开了驻所检察室。也许是我太在意那段驻所工作了，驻所工作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记，以致在我离开驻所检察室之后，驻所工作的情景，还会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尽管我做的是些琐碎小事，可我就是不能忘记那一段经历。于是，我写了30万字的《一位检察官的驻所日记》（下称《驻所日记》）。

客观就是实事求是，作品用日记体形式，写人记事，更真切真实，与检察官的品质可谓一脉相通。在驻所期间，我与看守所的几十名民警和监管卫生所的医护人员一道工作，接触过近千名形形色色的在押人员。《驻所日记》就是建立在如此充实的基础之

上，折射出丰富的内涵。我的真实写作，折射在对作品主题的选择上。驻所检察，可写的主题很多，如日常检察，制度建设，监督防止走过场等等。我拨开枝叶，直奔主干，选择了或者说提炼出认真履行驻所职责这一主题。这一主题一下将作品中的众多题材统领了起来。我参加民警们的交接班仪式、看守所的安全检查，参加狱情分析会，了解狱情动态、巡视监区，给在押人员上法治课，接待在押人员近亲属来访，输录检察日志，进行出入所检察等等，维护看守所的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公平公正、维护看守所的监管秩序稳定、维护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默默无闻地尽到自己的一份职责。我的真实写作，折射在对看守所

这种特殊的管理运作模式导致很多地区的革命法庭与地主官僚、土豪劣绅联系紧密，无法充分发挥其职能。七里坪革命法庭两任庭长张南一、闵丹桂，一位曾是打鼓说书艺人，一位曾是童养媳，他们来自人民，出身社会底层，看遍百姓疾苦，对群众遭遇过苦难与剥削感同身受。在他们的领导下，七里坪革命法庭始终坚守正义，不畏强权。两位庭长都牺牲在革命浪潮中，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司法系统烈士，而他们的鲜血也为“犁头旗”增添了光彩。从七里坪革命法庭的历史中汲取力量，传承和发扬这份人民情怀，警醒着后来人让人民司法制度在新时代焕发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人民的幸福安康而不懈奋斗。

从《红安县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布告》中，我们感受到人民司法制度蕴含的革命意志。该布告印发于第四次“围剿”时期，游击队队长吕正勇被人举报叛变投敌，为反动势力提供物资、信息等方面的帮助，时任庭长闵丹桂接到举报后，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带领革命法庭的审判人员调查核实，证据确凿之后将其抓捕归案，对吕正勇处以死刑并将吕正勇的罪行印于布告之上。该布告在红安县内四处张贴，传播甚广，极大地震慑了试图破坏革命的反动势力，也坚定了广大人民革命之气势不可阻挡的信心。

七里坪革命法庭在创建之初，董必武就坚持革命法庭的审判人员必须全部由共产党人组成，只有这样审判权才能牢牢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才能真正使革命法庭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在我们党推行土地革命时期，七里坪革命法庭使法律成为普罗大众捍卫权益的工具，通过一场场审判保障了土地革命运动的顺利进行。七里坪革命法庭存续时间虽短，

但与根据地的革命形势紧密相连，它的每一次审判、每一次行动，都推动了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必须用法律形式保护农民运动的正常发展”，是董必武提出的观点，也是七里坪革命法庭奉行的理念。七里坪革命法庭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法庭的雏形，《红安县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布告》是当今法院裁判文书的前身，该法庭在当时应用的苏维埃法律法令有200余个，依法办事牢牢印在了审判人员与当地群众的心中。该布告处罚相当，有法可依，以严谨的审判程序和公正的裁决结果成了法治精神的生动注脚，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借鉴。

苏维埃时期的法律法令虽在当时受限于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却已然勾勒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初步轮廓。200余个法律条文，涉及土地、劳动、婚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后来新中国全面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了早期的实践样本和经验借鉴。七里坪革命法庭严格的审判流程，如立案、调查、庭审、判决等环节，已经具备了现代司法程序的基本雏形。这种对程序正义的重视，被新中国成立后的司法体系所继承和发扬。当代司法审判中强调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正是对革命法庭时期司法理念的传承与升华。

九十余载制度更迭，革命法庭陈列依旧。鲜艳的犁头旗、朴素的长方桌，静静诉说着布告背后的故事，它们见证了革命法庭一次次公正的判决，见证了人民群众一张张喜极而泣或是如释重负的脸庞。《红安县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布告》与七里坪革命法庭如同一盏星火，在黑暗笼罩、不见前路的旧时代生发，在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的革命岁月中蓬勃顽强地燃烧，并逐渐汇聚成照亮法治前行道路的熊熊烈火。

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我们不变的初心，也是当代司法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根本遵循。我们坚信，只要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人民司法事业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绽放更加绚烂的光彩，使人民群众能够真正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影评

那一发无比精准的子弹

李凤玲

周末无事，窝在书房看了一部电影——北京国际电影节甄选电影《老枪》。犹记得，此前的东京国际电影节迎来的一个中国电影“大年”：中国电影《雪豹》斩获最佳影片大奖，《老枪》获得最佳艺术贡献奖，《草木人间》导演顾晓刚荣获“黑泽明奖”。《老枪》118分钟的片子，一帧不徐缓缓讲述，起承转合自然衔接，到最后的高潮更是让我将进度条几次后退再后退，必须几次三番反复琢磨才算尽了个兴。电影看完，我只想说：《老枪》是我心目中的年度最佳，没有之一。

电影《老枪》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个时期的关键词，是“失业”和“下岗”。片中的东北老城和老城里的奉林铁合金厂，也正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之中。墙壁斑驳的厂房，阴暗逼仄的楼道，给这部电影涂上了晦暗的底色。工人们多数都已经回家待工，在厂里上班的只剩保卫科的干事，他们负责看管厂里的物资，电影的主人公顾学兵便是其中的一员。

工厂凋敝，失窃事件频频发生，有外贼的觊觎侵入，有内贼的监守自盗，甚至还有内外勾连的串通勾连。铁合金厂嘛，偷点电缆或者钢铁出卖，其可观的获利让很多人铤而走险。而顾学兵作为保卫科干事，是该严格执行忠于职守还是为了利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他过的日子也满地狼藉不如人



电影《老枪》海报

物，他们的结局，无论悲情还是带着些微的喜悦，都是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下，关于人性的最真实的映照。但无论是人性的复杂多面，还是绝对的无良反叛，都在演员的走心演绎中，得到了真实而立体的展现。在这些演员当中，有些是响当当的老戏骨，有些则名不见经传，但他们都不靠流量靠演技，都特别精准地将每一个人物塑造得饱满立体、真实可信。电影《老枪》之所以成功，这又是一个关键因素。这何尝不是

民警和监管医护人员的真挚之爱上。我写看守所民警有的感化教育死刑犯，让罪不容恕的人，心怀感激而去；有的心如发，在与在押人员的谈话中发现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我写监管医护人员勇于担当，救治病危的在押人员，像对待社会病人一样对待生病的在押人员，发挥了医疗和协助监管的双重作用。他们普通，他们平凡，可他们信守他们。他们将自己绵薄的力量奉献给看守所的监管事业，自己坚守的工作岗位，他们用自己的激情，用自己的热情，播撒法律的阳光，矫正扭曲的心灵。我怀着真挚的感情去书写他们，称赞他们。对看守所民警和监管医护人员的称赞，也鼓励着我，让我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的真实写作，折射在对在押人

员的客观认识上。对在押人员，我与他们谈话，倾听他们的心声，解答他们的法律咨询，为他们提供尽可能的法律帮助。我写在押人员在新春之际，赋诗忏悔过去，渴望自由；写急功近利的大学生任在押人员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不禁流下悔恨的泪水；写激情犯罪的在押人员，对管教民警教育帮助的帮助；写懵懂未成年在押人员犯罪的单纯；写“精神病”在押人员的转化；写号房里的他们，给自己“量刑”，认识到犯罪的危害。就是死刑犯和绝食的在押人员，也一个个栩栩如生，如立眼前。人们看到的是，看守所同样“尊重和保障人权”“高墙里也有阳光”。

《驻所日记》不是摄像拍照，但它是真实的。我争取把驻所工作中的真实的人和事，概括描述得让人可读可信。《驻所日记》虽说记录的是在驻看守所检察室一年期间的经历，可我可以小见大的写作，映射出我国几十年来法治建设的发展历程，让人们看到当下公检法司的工作及律师的从业状况，让《驻所日记》仍有当下的价值和意义。

顾学兵，这个昔日的神枪手，再也不能忍了！他捂着流血肚子爬起来，奋力举起手中的枪，默念那句“精气回收”，然后毫不犹豫地射出了那发精准的子弹！这颗子弹，从车的后身穿入，然后无比精准地射中了劫匪。匪徒应声而倒，汽车轰然而止，被劫持的耿晓军得救了，工厂的款项保住了。

这发无比精准的子弹，呼应了顾学兵原本射击运动员的身份，也呼应了这个电影的主题。一直隐忍沉默的顾学兵，就是一把老枪！时代的浪潮起伏起伏，但人性的善良必须坚持，做人的底线必须恪守，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颗正义的子弹，必须向着扭曲的人性和邪恶的势力精准地射去！这发子弹啊，真的是太扣题也太解压了。子弹只是一种象征，它预示着在人生的关键节点，在善与恶的分岔处，每个人心中的坚守与义无反顾。

有人说，《老枪》宛如14年前的电影《钢的琴》。巧的是，《老枪》和《钢的琴》都是曾在东京电影节获奖的东北题材电影，但两者的境遇并不相同。当年《钢的琴》的命运，简直平坦到了极点。《钢的琴》拍摄过程中，张猛导演因资金短缺而面临全剧组停工，账上只剩下47元钱，主演秦海璐——她恰也是《老枪》的主演——自掏腰包，确保所有人的努力不白费。“年度最佳华语片”的名号下，《钢的琴》只有650万的票房，但这不妨碍整整14年来，它都是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华语电影之一。

如何讲好一个故事，以及讲好一个故事的魅力，也许这部电影会给我们启发。